

历代笔记选注

□□中国
古典文学
普及读物



出版社



I 245.1.15

616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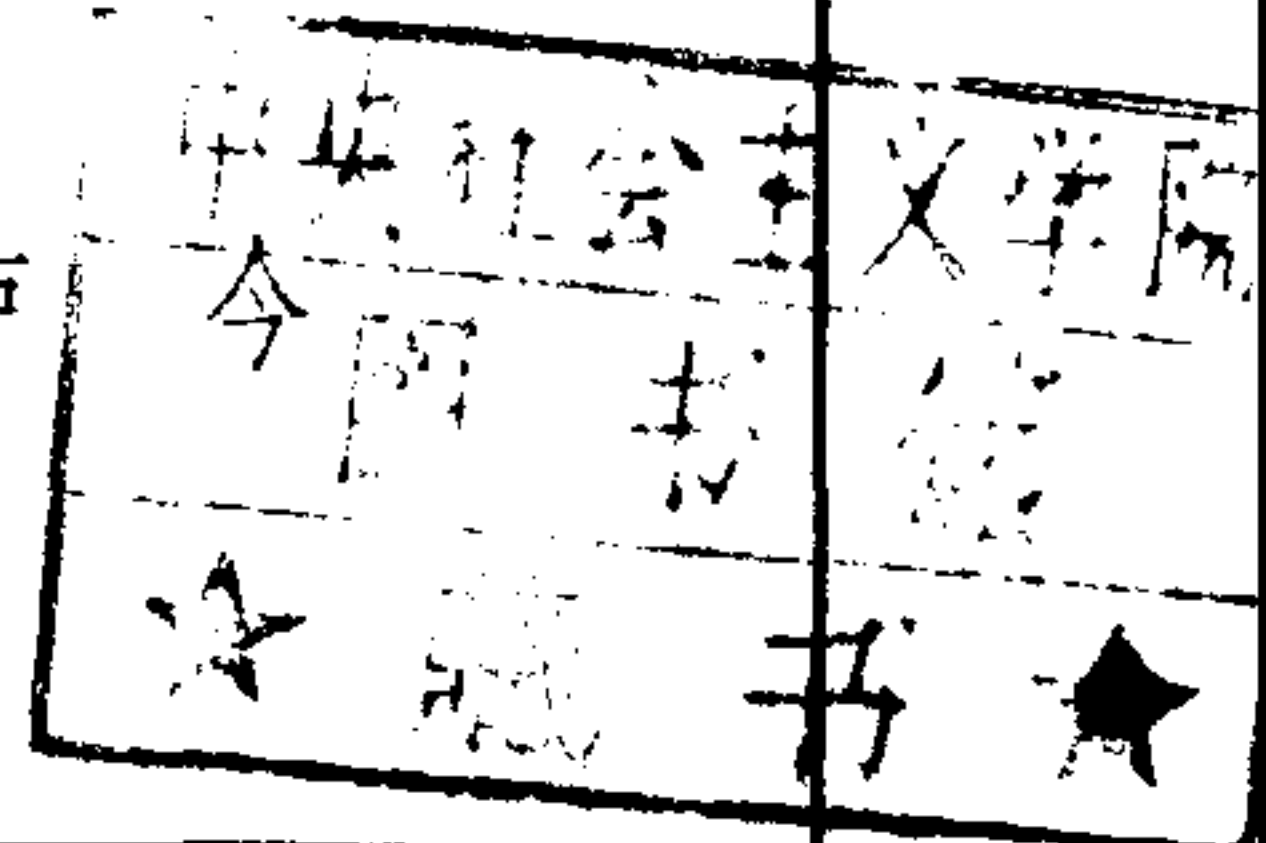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

历代笔记选注



200193940

周续赓 马啸风 卢



北京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
历代笔记选注
周续贻 马啸风 卢 今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1.5印张 334,000字
1983年12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2次印刷
印数 39,001—41,600
书号: 10071·472 定价: 3.55 元

前 言

一

这个集子收录了二百五十余则古代笔记作品，加以注释和评说。选文绝大多数出自笔记专集，共一百三十多种。

所谓笔记，首先指一种文体。这类文字写什么均无不可，而且叙事、议论、抒情纷披杂出，但以记叙琐事趣闻最为习见；篇幅长短随宜，而短小的居多；虽有写得庄重谨严的，大半则是信笔为之，不拘一格。如果把数十百条笔记汇编起来，就组成为笔记专集，于是，笔记又成了一种著述体制的名称。北宋的宋祁，首次以笔记一词为其随笔杂录之书命名，以后便被用来泛指同类的著作了。

笔记取材极广，而基本可分为三大类。

一是故事传说类。主要包括志怪和志人（轶闻琐语），寓言及笑话是它们的支流。这类一般以人物或

鬼怪为中心，有简单的情节，志怪纯属虚构，志人也不免掺杂想象夸饰，多多少少都带点小说的味道。其早期作品是唐宋以来文言短篇小说的前身，而这种简朴的样式，后世仍旧沿用下来。为了区别于近代的小说，人们称之为“笔记小说”。

再一类是杂史琐记。这类笔记或者掇拾历史旧闻，或者记述见闻时事，或者即兴遣怀发议，包罗万象，细大不捐，保存了历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科技、风土、社会生活及人物事件等多方面的材料。本类中关于人物事迹的琐记，与前一类的志人小说，界限不易划清。杂史常夹杂着附会之词，志人小说里也不无信史材料。

末一类是考辨评论。这类基本上是文艺、史地、哲学、典章制度、自然科学诸方面的治学或读书札记，内容涉及考经证史，评诗论文，记画言戏，释名辨物，训字析语等。

上面的分类，意在以简驭繁，仅能粗画眉目。事实上，一本笔记集里，常常兼有故事、史料、考索三种成分；一则之内，三者杂糅的也屡见不鲜。按照约定俗成的观念，题材越杂，越属正格。

我国古代的笔记，源远流长，丰富多彩，影响深广，直到今天，对我们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。

笔记包含着翔实可靠的史料，可以为正史纠谬补缺，帮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过去。有些篇章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足以振奋人心，陶冶性情。笔记的文学价值同样不容忽视。古代略具小说雏形的作品，大部分包罗在笔记里了，为后世小说和戏曲提供了素材，所积累的艺术经验也值得认真总结。同时，笔记当中又有第一流的小品、杂文、游记，以及俳谐性、说明性、应用性的文章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，在古代散文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，有待我们去发掘整理。还应注意的是，笔记结集了前人大量宝贵的治学成果，现在无论从事哪门学科的研究，都能从中获取相当有用的资料。总之，读点古代笔记，不仅能增长知识，开阔视野，启迪智慧，受到教育，并且有助于发扬古代笔记文的优良传统，从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地。

二

古代笔记的历史十分悠久。它导源于先秦两汉，兴起于魏晋南北朝，唐宋时已经成熟，至明清而极盛。

笔记式的文字早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。春秋战国期间，历史散文、诸子散文蔚为大观，这些史书子书，

就其总体性质而言属于学术专著，可是，单看某些著作的组织形式，或者观其一节一节，与后来的笔记多有相近之处。《论语》是片断言行的杂纂，《礼记》为杂记杂考的汇编，《韩非子·说林》无异于故事和寓言的丛集。搜罗神话与博物的《山海经》，采编二百多则小故事的《晏子春秋》，更可视为笔记体的滥觞。足见笔记中常见的历史故事、神怪故事、寓言笑话、琐记语录等体裁，以及杂组编集的方法，都源出于先秦散文。

两汉正式有了笔记专书。刘向在整理古籍过程中，辑录经、史、子、集的言论和故事，编成《说苑》与《新序》，可以算是最早的杂史性笔记，不过，它基本停留在编辑旧文的阶段，而非有意识的创作。

到魏晋南北朝期间，笔记体才渐趋独立，著作亦接踵而出。下面约略地勾勒一下从魏晋至晚清三类笔记演化的轮廓。先从故事传说类讲起。

魏晋南北朝的故事传说类笔记分志怪志人两大流派，而以前者为大宗。汉末以来，社会动乱多难，人们难于掌握自身的命运，富贵者渴求长生尊荣，贫贱者希图精神上的解脱，于是固有的迷信思想，汇同新输入的佛教观念，大肆泛滥，从而刺激了鬼神怪异笔记的写作。记载殊方绝域山川物产的《博物志》，辑

录神仙鬼怪故事的《搜神记》，叙述古代神怪传说和仙山灵异的《拾遗记》，最有代表性。志怪大多荒唐无稽，但其中也存有民间优秀的传说，在怪诞的外衣下，包孕着人民群众的善恶观念，以及他们反抗强暴、追求自由的社会理想。另外，魏晋崇尚名士，士大夫沿袭汉末的“清议”之风，讲究言谈举止和品评人物，他们的言行趣闻流传甚广，尤其被学做名士的人所注目，记载名流们奇行隽语的志人小说便应运而生，保存至今的有《世说新语》。它冲破了侈言鬼神的窠臼，专写现实的人事，生动传神地反映出这个时代上流社会的精神风貌。志怪志人之外，还首次出现了《笑林》等笑话专集。魏晋南北朝笔记故事的基本特征，一是以史笔为法，作者主观上旨在记实，连灵怪鬼神的传闻也看作实有，记载的目的无非是述异炫博，或寓意劝惩。其次，写法贵在简约，叙事则粗陈梗概，记人则多采片断，文词概括简洁，语言崇尚质朴隽永。

继承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的传统，每代均不乏新作。《世说新语》类型的作品，有《大唐新语》、《唐语林》、《今世说》等，可惜多属模仿，缺乏创造性，在传神写貌上未能与开山之作相抗衡。志怪作品犹如强弩之末，日益沦为封建主义和宗教迷信的传声筒，

相当长一个时期内，仅《夷坚志》等寥寥几种间有可取。而到了清代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又复为一振。作者纪昀虽以“有益于劝惩”、“不乖于风教”为宗旨，假托狐鬼来宣扬忠孝节义与因果报应观念，但其内容仍有一些积极方面，加以叙事简明，说理透辟，文笔之佳确实不可多得，当时曾风靡海内，不是偶然的。至于笑话寓言一类作品，唐宋以来的《艾子杂说》、《应谐录》、《雪涛谐史》、《传家宝》等是其佼佼者。《古今谭概》纂集子、史、笔记中的趣闻，被人誉为“诙谐大全”。这些专集佳制，揭示社会的病态，描绘愚陋的脸谱，富于哲理，发人深省。这里还需补充说明一点，就是唐宋传奇直至《聊斋志异》等一大批作品，尽管也是在魏晋笔记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，而它们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，不便于再当作笔记了，只是其中一些“残丛小语”式的短篇，还不离笔记的本色。

一般认为出于晋人之手的《西京杂记》，是典型的杂史琐记类笔记。其书记叙西汉的轶闻，长安的宫苑故事，杂有怪诞的传说，还牵涉到民俗和典制，与单纯的志人或志怪有别，而文学意味也较浓，它对占主导地位的综合杂组型笔记的发展，影响很大。

杂史琐记笔记在唐宋时进入成熟阶段。成熟的标

志有以下几个。一为数量大增。由于编辑史书、整理史料的风气空前盛行，私人撰写的杂史如雨后春笋。唐五代的《隋唐嘉话》、《朝野僉载》、《唐国史补》、《因话录》、《唐摭言》，两宋的《归田录》、《涑水纪闻》、《志林》、《挥麈录》、《老学庵笔记》、《岭外代答》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武林旧事》等，皆负盛名。二是杂史逐渐与志怪划清了界限，增加了写实成分，摒除了神异的色彩，比较可靠地记载了人物史事、典章制度和种种社会状况，因而常被正史编纂者所撷取。第三是地位上升。笔记作为一种著述体制，已经被人们广泛地使用。宋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都曾从事笔记的写作。一些作者不是把历来信手所写的零星杂记连缀成帙，而是有计划、倾注心力地去完成一部笔记体的著作。第四是增强了文学性。这是唐宋文学的普遍高涨，特别是古文运动直接推动的结果。古文运动的大师们开通了散文写作的阳关大道，笔记的辞章水平相应地得以提高，把朴拙的记叙文字变成了文艺性的小品。韩、柳、欧、苏等作家创造了不少散文新品种，连同理学家利用的语录体，都为笔记作者提供了借鉴。在给杂史琐记注入充分的文学素质方面，首功应当归于苏轼。他的《志林》一书，题材甚广，体裁多样，文采斐然，融叙事、写景、状物、抒情、

议论于一炉，神韵天然，同《世说新语》一样，都是笔记史上的丰碑。

元明至清末的杂史琐记仍相当繁富，如《南村辍耕录》、《菽园杂记》、《万历野获编》、《帝京景物略》、《陶庵梦忆》、《池北偶谈》、《茶余客话》、《履园丛话》、《归田琐记》、《啸亭杂录》、《春在堂随笔》、《瀛壖杂志》，等等，所记时事政治、社会风情、艺文掌故的材料，多有可采。在此期间，公安派倡导的晚明小品，对杂史琐记笔记有推波助澜之功。袁宏道和后继者张岱等人，标举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，追求文学之趣，制作之新，以平易浅近、秀逸娟丽的笔调，描述自然景物、人情风土、日常琐事，感情细腻，韵味浓郁。他们把六朝作者到苏轼所开创的小品文定型化了，丰富了表现技巧，形成一个文学流派，并促进了笔记小品专集的产生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汉儒说解经书的章句训诂之作，开了考辨笔记的先河。唐代的《封氏闻见记》，兼载传说轶事，而以考证典章与风俗为主，标志着考辨类笔记从杂史琐记当中分化了出来。及至宋元，《梦溪笔谈》、《容斋随笔》、《困学纪闻》等，考辨成分更重，或长于文史，或偏于经义，或致力于科技，科学性都比较强。明代学风空疏，而《四友斋丛说》、《少

室山房笔丛》、《五杂俎》等尚属精博。清初，在政治压迫下，知识分子倾心于考据，朴学兴盛，余风延及清末，《日知录》、《陔余丛考》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等大型的考辨笔记，堪称学术史上的力作。著者都是大学人、大通家，见识既高，考辨多精，为科学研究作了坚实的资料准备工作。

纵观笔记发展的历史，不难看出，笔记作为一种文体和著述体制，愈益被广泛采用，其题材范围日见扩大，文章样式也更趋繁多，在数量增加的同时，增添了文采，终于从幼苗成长为挺拔的大树，每条枝干上都结满了累累硕果。

三

笔记一体由萌芽到成熟，久而不衰，其原因何在呢？从那些成功的作品中，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一些独特之处，正是这些特色使笔记为人们所喜闻乐见。

首先，许多笔记是随意不拘的。在封建时代，笔记的地位远比正宗的诗文和史传要低，这种传统意识反而使作者卸掉些包袱，撇开点框框。他们不必弹唱一律的八股调头，无需曲意逢迎权贵，也不汲汲仿古以求传世立名。一些经世著作不敢写或不屑于写的，笔记作者并不嫌弃。他们顾忌较少，该怎么说就怎么

说，因而在反映历史的真相上，有时比正史或官样文章真实生动和具体。例如，北宋统治者把王小波、李顺的起义诬为洪水猛兽，又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始终不敢承认官军镇压起义时所杀的是假李顺。《宋史》的编纂者则完全承袭了宋代官方的材料。但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，客观地记述了起义队伍策略的正确，军纪的严明，如实披露出李顺被群众掩护三十余年的真情。又如，《明史·世宗纪》载：“冬十月丁酉，宫人谋逆伏诛，磔端妃曹氏、宁嫔王氏于市。”对事件的内情尽行回避。而《万历野获编》则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揭示了出来：

嘉靖壬寅年，宫婢相结行弑，用绳系上（世宗）喉，翻布塞上口，以数人踞上腹绞之。已垂绝矣，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，绳股缓不收，户外闻咯咯声，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，立缚行弑者赴法。时上乍苏，广省人事，一时处分，尽出孝烈，其中不无平日所憎，乘机滥入者。

（下略刑部奏疏及开列的十六名宫婢犯人名单）

其它如《纳米之弊》、《点选绣女》、《贼开花》、《宰白鸭》等篇，在暴露统治者的荒淫或吏治的黑暗方面，相当深刻有力，而这些史料却不见于正史。鲁迅先生说：史官的记载“涂饰太厚，废话太多，所以很不容

易察出底细来。……但如看野史和杂记，可更容易了然了，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。”（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（四）》）又说：“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，挟恩怨，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，因为它究竟不象正史那样装腔作势。”（《华盖集·这个与那个》）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。基于同样的认识，毛泽东同志给毛岸英的信中也说：“你要看历史小说，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。”（见《新体育》1978年12期载毛岸青、邵华：《爸爸希望我们壮健进步》）

思想上的束缚较少，笔下也随之自由轻松。笔记也讲军国大事，立论发议，褒贬人物，但因作者与史官所处地位不同，并不摆起严峻的面孔，而象说闲话一般，平易宽缓。笔记又名“漫录”、“随笔”，所谓“漫”和“随”，含义不止一端，而很重要的是指那通脱的态度，娓娓絮谈的气氛。所以人们手执笔记，不会有望而生畏之感。

如果说野史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反映历史事件的真实，琐记小品就更容易表现出作家的真实。作者耳目有接，当即挥毫，意兴所至，笔亦随之，经院气、道学气通常要少几分。这类文字如同日记、书信一样，是作者内心的自白，自作的注脚。他们的胸襟气质、才学见识、生活风貌和创作特色，往往袒露得直接而

鲜明，人们从这任性而发的作品里，可以看到活生生的苏东坡、陆放翁、袁中郎和曲园老人。

短小精悍、质朴自然，是多数笔记的又一特色。

笔记的篇制短小，与每则内容单一有关。同时，又因为它非规格化的文章，不受严格的体裁的局限，也不太讲究布局谋篇。篇幅小，就要求直截了当，舍去枝蔓，只留下最精粹的部分。即使叙述纷繁的事，并不需源源本本，只求理清头绪。试看《聊斋志异》这样描述一次大地震：

忽闻有声如雷，自东南来，向西北去。众骇异，不解其故。俄而几案摆簸，酒杯倾覆；屋梁椽柱，错折有声。相顾失色。久之，方知地震，各疾趋出。见楼阁房舍，仆而复起；墙倾屋塌之声，与儿啼女号，喧如鼎沸。人眩晕不能立，坐地上，随地转侧，河水倾波丈余，鸡鸣犬吠满城中。逾一时许，始稍定。视街上，则男女裸聚，竞相告语，并忘其未衣也。

它尽量地收敛浓缩，不事渲染铺陈，而百数十字胜过万语千言。

笔记没有什么独特的写作技巧，一般文章的写法，它都可以使用，而以单纯明快见长。叙事，清晰明白，

《地震》就是一个范例；讲道理，大多因事触发，片言破的，不是纵横开合的滔滔议论；抒情，那感情是经过升华的，绝少长江大河式的倾泻；说明，则条理井然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至于考据文字，做到理充辞畅，就属上乘。

在一些写实性的小故事里，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，就是没有过分曲折的情节。《南村辍耕录》的《郭氏死难》，写一个农村妇女因有姿色被逼得家破人亡。笔录者未尝不可以添枝加叶，编造离奇的情节，但他只是老老实实地述说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事。看似平淡，但人物内在的美丑，事情合乎逻辑的进程，却拨动着人们的心弦，令读者置信不疑。

笔记不致力于面面俱到地塑造人物形象，它擅长的是剪下人物的侧影，惯常的手法是白描。白描即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，通过人物富有特征的片言只语、行动细节，去具现其性格、心理和神韵。《三借庐笔谈》记明末的杨廷枢誓死抗清，后被捕获，

临刑时，仰天长啸，连呼“大明”。头已落地，而“大”字尚有声可听。

象一幅粗线条的速写画，凸现了怒发冲冠、沉毅刚烈

的英雄形象。《世说新语》写东晋王蓝田的一件轶事：

尝食鸡子，以箸刺之不得，便大怒，举以掷地。鸡子于地圆转未止，仍下地以屐齿碾之，又不得。瞋甚，复于地取内口中，嚙破，即吐之。

这里，作者抓住了符合王蓝田性格的特殊行动，单线平涂，使之形神酷肖，声态宛然。笔记里相当多的轶闻，都是用最经济的笔墨，传达出人物的一颦一笑，以少总多，以局部暗示整体，留给读者以想象的余地。

笔记作者多以浅近的文言写作，避免晦涩艰深，满纸典故。他们大抵不会在写完之后再下一番更换熟字为古字，尽量删去虚词，或者协调声韵的功夫。虽说缺少浓郁奇崛之美，铿锵顿挫之音，却往往清通可诵。清代桐城派古文家论文，强调古文不宜用小说语、语录语、俚俗语，其实笔记正是在兼收并蓄这类语言中，显示出通俗化、多样化的优点。一些文学性强的笔记文比较雅洁，语言常兼采魏晋文章的疏淡峻洁和唐宋文章的凝炼流畅，而较之正规古文更为自然活脱。如苏轼的小品就有行云流水之妙，无艰难劳